



“左联”刊物《萌芽》

贾植芳在给孔海珠的著作《左翼·上海》序中讲了一个细节，让人唏嘘不已。1990年，贾植芳被邀重访日本的时候，当时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共产党的老党员丸山昇对他说：“中国的30年代‘左联’文学，你们中国人现在不研究了，而我们日本人还在研究。”对此，贾植芳很受触动地说，“左联”的学术资源并非已被我们开采殆尽，“左联”的意义还远没有穷尽，其复杂性和历史的深邃性甚至大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其它文学现象。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新时期以来，在追求文学自主性和本体性的过程中，“左联”研究一度陷入困顿，左翼文学的价值曾因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深度关联而被极度贬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新世纪人们重新发现社会贫富分化、两极对立严重，乃至处于一种新的阶层“断裂”（孙立平语）的时候，当到处都是“中产阶级”、“成功人士”的声音，诗歌、哲学、爱情被金钱和物欲所践踏在地、人们只关心眼前鼻子底下那一小点利益的时候，学者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开启了对“底层”（蔡翔语）、“岗位”意识（陈思和语）和“新意识形态”（王晓明语）等新概念、新语汇和新意识的思考和探讨。在学者思考如何命名这种“新意识形态”的时候，作家们也开始拿起了文学的武器，进行“底层叙述”的文学写作，以此来寻求抗衡“新意识形态”的精神武器。“左联”、“左翼文学”重新成为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批判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我们在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的同时，也要进一步厘清“左联”的精神内核，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思考“左联”、“左翼文学”的精神价值、意义和局限，从而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提供精神支撑和思想启示。

左翼文学的发生和“左联”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更深的意义而言，是“士志于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革命”一词在不同的语境里有不同的含义。它既指政权更迭，建立民族国家的一种诉求，也指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在生活方式及处世观念中的现代需求。有时候也窄化为对生命、肉体的消炎的本土原始含义。早期左翼作家笔下的革命有多重含义，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革命的目标都是指向更为美好的未来，指向更为合理的发展，指向更为人性的生活。总而言之，革命所要达到的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时间维度上，它隐含了越来越好的现代性的线型发展观念。

革命：摧毁万恶旧世界、跃向光明美好之未来世界的惟一途径

在现代历史时期，革命话语翻天覆地遍布中国大地，革命思想及行为从星星之火导向燎原之势，归根到底还是由于革命作为现代性话语给予人们“生活更加美好”的诱惑。像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中所说的“现代革命的倾向，就是要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革命话语所允诺的未来生活是一种现代文明社会里拥有的生活，是在中国开天辟地与传统迥然不同的现代生活，对全新生活的想象激发着民众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使革命的浪潮居高不下。

革命既然是以建构美好合理的社会为标的，那么革命最为合法性的依据是目前社会的不合理及诸多缺陷。蒋光慈的作品中多次表达过贫富悬殊的不公正社会所给予无产者心理上的刺激，从中印证革命的合法性依据。如在《冲出云雾的月亮》中，曼英所感觉到的社会是“可怕的罗网”，是“狰狞的恶意”，引起她产生报复社会之心理的正是难以逾越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这个世界是属于“无忧无虑的西装少年，花花公子”，以及“艳装治服的少奶奶，太太和小姐”，和“翩翩的大腹贾”、“坐在汽车中的傲然的帝国主义者”的，而她及“其余的穷苦的人们没有份”。所以她想到，“如果有一颗巨弹！如果有一把烈火！毁灭掉，一齐都毁灭掉，落得一个痛痛快快的同归于尽……”

蒋光慈在小说中指明，这种两极分化归因于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作者通过曼英对一个有为青年李士毅的感受来说明这一点：“李士毅给了她一个巨大的刺激，使得她即刻就要将这个不公道的、黑暗的、残酷的世界毁灭掉。他，李士毅，无论在何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青年，而且他是一个极忠勇的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但是他现在这般的受着社会的虐待，忍受着饥寒……同时，那些翩翩的大腹贾，那些丰衣足食的少爷公子，那些拥有福利的人们……有的已经穿上轻暖的狐裘了……”有为青年受饥挨饿，而庸众恣情享乐。这确实是一个没有公道和正义的社会。毁灭这样的社会建立一个公正合法的社会符合多数人的意愿，而必须通过革命，才能达到这样的意愿。蒋光慈的诗作《我背着手儿在大马路上漫踱》中写到，上海的街头满是“这富丽繁华的商店，这高大的洋房，/这脂粉的香味，这花红柳绿的衣

“左联”精神：刺穿“无物之阵”的思想长矛

□张丽军

乐而乐”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思想的继承、延续和新的演化，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历史文化语境逐渐形成的。中国士大夫自古就有为民请命、为底层劳动者疾苦而歌的人民性思想传统，在“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传入中国之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了从传统士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的历史性转变，不再是自发的、感性的吟咏，而是具有阶级性思想意识的文化自觉和使命担当。可以说，左翼文学的书写和“左联”的成立，正是这种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的人民性精神血脉和外来阶级性新文化理念的有机结合与创新创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渐渐占据了思想界的先锋性位置。李大钊不仅是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中国知识界的先驱者，而且还是最早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积极召唤“左翼文学”的革命先驱者。1917年，李大钊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一文中提出了“革命文学之鼓吹”的新主张。1921年，郑振铎发表《血和泪的文学》，提出“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然而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的被扰乱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恐总非他们所能安慰得了的吧。”提倡表现“血和泪的文学”的文学观是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对文学审美功能的新理解。1921年，耿济之在《〈前夜〉序》中，通过对《前夜》作者屠格涅夫革命倾向性与写作姿态的分析，阐明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改造社会、人生的功用与价值的新认知：

屠格涅夫实在是厌弃白尔森涅夫和苏宾两人学问和艺术的事业，而推崇沙洛夫这种切志救国、铁肩担道的精神。然而读者不要误会：屠格涅夫并不是反对学问和艺术的事业，他也不知道这种事业在社会上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俄国“当时”所最为需要的并不只是这种事业，却是需要实地改造的力量和精神。他在自己小说里不但对于白尔森涅夫和苏宾表示蔑视的意思，并且一再否认与他同时的各种人。小说里有一处可以证明出他的意思，他说：像沙洛夫这种人现在是没有的了，所有的只是喧嚣者，鼓锤子，和从空虚移到虚空的人。这句话真是骂尽俄国当时的人，形容俄国当时社会的情形！所以这篇小说实在是俄国青年的兴奋剧，凡读着这本书，便明白自己的责任并不在于空虚飘渺的言论，而在于实地去做改造社会的工作。此书一出，俄国不少青年男女都觉悟过来，争着学沙洛夫和叶林娜的榜样大张“争自由”“谋解放”的旗帜，以做各种民间的运动，而促成社会的改革。由此可见文学与社会和人生实在是很有关系的。中国有句成语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现在可以换一句“文学造时势，时势造文学”的话了。

屠格涅夫这种遗弃“学问和艺术的事业”写作姿态和“切志救国，铁肩担道”的精神追求，得到了异域翻译家耿济之的

深刻理解、精神共鸣和行动响应。这与后来的中国左翼文学家宁肯牺牲文学的“艺术性”，也要追求文学的“革命性”的文学理念，有着内在精神理念的一致性。耿济之的认识与阐释，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屠格涅夫”们和左翼文学提供了一面基于更高的利益、更高的理想、趋向终极价值——“止于至善”的精神之镜。

正是在这种新认知、新理念之下，1923年茅盾发表《大转变时期》一文的文章，批评中国知识阶级中名士思想的毒，主张“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的现代“活文学”，大声呼喊“我希望从此以后就是国内文坛的大转变时期”。1926年，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从法国大革命谈起，认为现在进入了“第四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而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地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地，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除此以外地文艺已经是过去了的。包含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的古典主义，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都已经过去了。”1928年，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李初梨的《怎样建设革命文学》不仅表达了创造社作家左翼化的思想转变和明确的“革命文学”要求，而且对革命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进行了理论探素，提出“讽刺的、暴露的、鼓动的、教导的”四种革命文学形态，同时把暴露黑暗的现实主义文学视为革命文学的障碍，必须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鲁迅对此提出了批评。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单一维度强调追求光明、反对暴露的左倾幼稚病和非此即彼的思想模式，在日后的延安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艺政策中得到了延续、发展。

在中共的指导下，在鲁迅、茅盾等人的批评下，“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及时调整文艺路线，并取得了鲁迅等人的理解与支持。在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审美理念的思想共识下，1930年3月2日，鲁迅、郑伯奇、冯乃超、钱杏邨、蒋光慈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使“革命文学”从狭隘走向更为宽广，在承继和断裂中使五四文学从平民文学发展为具有新型性质的“左翼文学”。因此，阶级性是“左联”及其左翼文学的工具理性；而人民性，即止于至善的、让中华民族获得独立、中国最大多数底层民众获得解放与幸福的精神理念，是左翼文学的价值理性之所在。在这个短兵相接、不容犹豫的时代，在这个“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峻急迫切时代里，左翼文学呈现一种近乎无奈而又毫不犹豫的“速朽”美学，即哪怕这种文学是工具性大于审美性，是革命性大于艺术性，是“速朽”的文学，只要有益于时代、民族、国家和底层大众，文学速朽又如何。所以，对于“左联”和左翼文学，我们衡量和评价的尺度，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和审美的尺度，而且更应该是“以身殉道”、燃烧整个灵魂至身体和生命的革命尺度、精神尺度和“大善大美”的哲学伦理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左联”及其左翼文学是内容、精神远远高于审美、艺术的，是

突破了文学疆域的“爱的大纛”的文学，是鲁迅所言“文学，是战斗的”艺术。这正是“左联”及其左翼文学的精神价值所在，是其在新世纪重新复活的精神生命基因所在。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从《诗经》和《离骚》分别发展出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五四新文化先驱者同样建构并形成了“新文学传统”。“左联”和左翼文学所形成的“左联精神”就是“新文学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茅盾以书面发言的形式，阐释了“左联”精神传统：

“‘左联’在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在30年代，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创导无产阶级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培育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以及全国解放以后的文化艺术事业中，到处可以看到当年‘左联’的同志在起着骨干的、核心的作用。因此，‘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我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对此，茅盾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相信年青的一代一定能继承和发扬‘左联’的革命传统，继承党所领导文艺的传统，而且后来居上。”茅盾的希望是殷切的，提出的问题是很现实的。在这次大会上，胡乔木从根源上，直接指出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与左联、左翼文化的内在承继关系——“我们现在的文艺和文化仍然是左翼文艺和左翼文化，是30年代的革命的文化的继续”，“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今天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最革命的文化，也就是最左翼的文化，可以说是很普通的常识。”但是，正如胡乔木本人说的，“可是也许因为这是很普通的常识，有的时候却会被人遗忘，被人忽略。”毋庸讳言，左翼文学理念是有一些问题的，存在着对文学本体自觉认知的深度缺失；但是，其忧国忧民、为天下苍生“代言”的人民性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也是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所绵延不绝的艺术精神血脉。

新中国建立初期，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质的差异，存在着文学力量新与旧的更替，存在着文学书写对象与内容的新要求，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和左翼文学精神是一脉相承、渊源不断的。新中国向何处去，古老的乡土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这是新中国作家所殚精竭虑的时代大问题，承载着源于古老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和“左联”精神传统的共通血脉。从新中国成立前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新中国成立后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从柳青的《创业史》到新时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从张炜的《古船》到贾平凹的《高兴》，从莫言的《红高粱》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无不呈现出一种关于乡土中国如何进行现代转型的宏大思考，无不呈现出对封建文化、资本势力和现代性内在悖论的巨大警惕和深刻批判，是“左联”精神及其人民性思想传统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书写和精神演化。

好了的“角色”规范里生活，久而久之失去其原始本性，沦为角色的奴隶，异化为没有自身情感的活动的家具。生命就在这种循规蹈矩、一成不变死水一般的生活中磨蚀掉，没有思想，更无从奢谈生命激情。“五四”个性解放唤醒了一批青年，这些人不甘心自己的生命热力在封建家族中消殒，于是离家出走，外出寻求属于自己所有的个性与自由，寻求自己所渴望的现代生活方式。蒋光慈的小说深受欢迎，也是因为其反映了新旧交替时代人们对新生活激情渴望的一种情绪。而革命者进行革命，也是受激情生活的驱使。茅盾小说《幻灭》中，写到静女士在医院当看护时遇到一个姓强名猛的军官，自己说是因为厌倦了周围的平凡，才做了革命党，才进了军队”。这个军官坦言，他到战场上打仗不是为了什么神圣的口号，甚至也不是为了胜负，而单纯就是为了“强烈的刺激”：“别人冠冕堂皇说是为什么为什么而战，我老老实实对你说，我喜欢打仗，不为别的，单为自己要求强烈的刺激！打胜打败，于我倒不相干！”他认为人生最强烈的刺激就是在战场上，所以战场对于他的引诱力，比什么都强烈。因为“战场能给人的经验缩短。希望，鼓舞，愤怒，破坏，牺牲——一切经验，你须得活半世去尝到的，在战场上，几小时内就全有了。”他喜欢战场的未来主义特征：“强烈的刺激，破坏，变化，疯狂似的杀，威力的崇拜，一应俱全。”所以他呼叫：“……呵，刺激，强烈的刺激！和战场生活比较，后方的生活简直是麻木的，死的。”

在这位军官眼中，刺激的生活才是真的生活，才是“活”的生活。而在《追求》中，茅盾重笔泼墨描画的，也是一位不甘心于平淡生活、处处求新奇、期望在革命中寻求激情生活的青年——章秋柳。章秋柳也觉得短时期的热烈的生活实在比长时间的平凡的生活有意义得多”。她的生存哲学即是“不要平凡”！为了追求刺激的生活、她“甚至于想到地狱里，到血泊中”。在章秋柳这里，热烈的、刺激地生活着才有生命的意义。这样的生活是符合人性的，所以是“道德的”、“合理的”，表达了对一种有活力的激情生活的推崇。对革命中那种脱离平庸停滞的日常生活的丰富体验，是一种动荡不宁的求新求变精神。别尔嘉耶夫在论述革命的意义的时候，肯定的也是革命给予人类的丰富体验：“革命是伟大的体验，这个体验既使人贫乏，也丰富人。贫穷的本身就是一种丰富。……在革命中，新的平民阶层总是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政权、后果并不真正为他注重，正如他所坦言的；‘革命的诗人爱的是‘革命的心灵’，‘而非革命的理性和计划’。”“他在革命中看见了电光雪浪，他爱革命永远地送来意外的，新的事物。”（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所需要的，就是革命生活中那种脱离平庸停滞的日常生活的丰富体验，是一种动荡不宁的求新求变精神。别尔嘉耶夫在论述革命的意义的时候，肯定的也是革命给予人类的丰富体验：“革命是伟大的体验，这个体验既使人贫乏，也丰富人。贫穷的本身就是一种丰富。……在革命中，新的平民阶层总是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政权、后果并不真正为他注重，正如他所坦言的；‘革命的诗人爱的是‘革命的心灵’，‘而非革命的理性和计划’。”“他在革命中看见了电光雪浪，他爱革命永远地送来意外的，新的事物。”（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所需要的，就是革命生活中那种脱离平庸停滞的日常生活的丰富体验，是一种动荡不宁的求新求变精神。别尔嘉耶夫在论

述革命的意义的时候，肯定的也是革命给予人类的丰富体验：“革命是伟大的体验，这个体验既使人贫乏，也丰富人。贫穷的本身就是一种丰富。……在革命中，新的平民阶层总是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政权、后果并不真正为他注重，正如他所坦言的；‘革命的诗人爱的是‘革命的心灵’，‘而非革命的理性和计划’。”“他在革命中看见了电光雪浪，他爱革命永远地送来意外的，新的事物。”（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所需要的，就是革命生活中那种脱离平庸停滞的日常生活的丰富体验，是一种动荡不宁的求新求变精神。别尔嘉耶夫在论

述革命的意义的时候，肯定的也是革命给予人类的丰富体验：“革命是伟大的体验，这个体验既使人贫乏，也丰富人。贫穷的本身就是一种丰富。……在革命中，新的平民阶层总是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政权、后果并不真正为他注重，正如他所坦言的；‘革命的诗人爱的是‘革命的心灵’，‘而非革命的理性和计划’。”“他在革命中看见了电光雪浪，他爱革命永远地送来意外的，新的事物。”（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所需要的，就是革命生活中那种脱离平庸停滞的日常生活的丰富体验，是一种动荡不宁的求新求变精神。别尔嘉耶夫在论

早期左翼作家的革命书写

□刘永丽

活的实感’，而是想象。”

可以说，早期左翼革命书写中所表达的，更多的确实是一种对新生活的想象。但并非因其是对革命新生活的想象就没有其价值意义。蒋光慈认为，文学应该记载社会的一种情绪：“文学家是代表社会的情绪的（我始终是这样的主张），并且文学家负有鼓动社会的情绪之责任。”而这种情绪的记载也有其重大意义：“我们听见了文学家的高呼狂喊，可以证明社会的情绪不是死的，并且有奋兴的希望。”（蒋光慈，《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确实，革命，首先是一种情绪的鼓动及宣扬，正如战场上对士兵士气的鼓动与激发一样。革命书写中情绪的宣扬是吸引更多的投入到革命战争中去从而获取胜利的最有效的方式。蒋光慈的小说大受欢迎，也说明了其小说中那种奋进的昂扬的情调合乎了时代潮流。

不只是蒋光慈，被誉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茅盾在最初写革命三部曲《蚀》的小说创作中，也并非按照客观现实来描写都市生活，而是更多地放进了自己的感情、自身的生命体验在里面。据陈建华的分析，茅盾最初的作品中，一些女性成为他写小说的起因，与什么主义，革命或小说写法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最有关系的是作者的一腔情怀，一段追忆，一个感性或感性的世界，其中充满激情与狂想”。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

其中最主要原因，是革命的现代性话语给予了人们未来生活“更加美好”的允诺。正是革命宣传话语中对革命胜利后的醉人图景的描绘，激发了民众追随革命的无限热情，激起革命者砸碎、摧毁现有一切的蓬勃野性和内心深处的生命激情。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源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需要指出的一点是，20世纪初如火如荼燃娆着的革命思想的涌起也和其时盛行的进化论思想有密切关联。进化论遵循的是一种线型发展的历史观和时间观。进化论认为，地球及其生活于其上的动植物，其发生、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地上升的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无限、无止境地向未来延伸着的。这就使得将来具有了永远的正面价值和意义。将来必定是更美好的、更有价值乃至更具有神圣性的。阳翰笙曾指出革命的罗曼谛克的特征：“只主观的把现实的残酷斗争理想化、神秘化，高尚化，以至于罗曼谛克化。”这句话不仅指出革命小说存在的想象成分，而且暗示出了书写者所受的进化论思想的鼓动，相信革命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经过多次的挫折，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光明的。正是进化论给

革命最具有诱惑力的地方正是革命所给予人们生命的丰富，所给予民众的那种生命激情。这种激情对于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中国人历经了几千年来自封建思想的禁锢压制，已经被塑造为没有自我生命意识及感觉的动物。父权森严的家族制使家族中人必须在设定